

# 美国文学的公共议题与私人书写\*

陈俐利

**摘要：**2020年美国文学的获奖情况体现了公共议题与私人化写作的分野。国内文学大奖颁发给《失踪儿童档案》《唐人街内部》《尼克尔男孩》，体现了对移民种族等公共议题的现实观照，是去年文坛反特朗普主义的延续。获国际大奖的作家及作品——无论是诺贝尔奖得主格吕克的诗歌，还是布克奖之作《舒吉·贝恩》都属于私人化写作，和文学性更加亲缘，体现了超越性的政治正确。这种文艺反映论与自足论之别，前者映射、放大了立场差异，后者因审美成就更具普世性，更具有弥合现实差异的可能。

**关键词：**美国年度文学 种族 移民 私人化写作

2020年是美国文坛的获奖大年：美国作家屡屡斩获国际性大奖——诺贝尔文学奖（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和布克奖（Man Booker Prize），其作品对个体经验的诗意书写备受评委称赞。与此同时，美国国内重要文学奖：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普利策奖（The Pulitzer Prize）作品均指向了种族、移民等公共议题。这种国际、本土奖项对公共时事与个体经验表征的不同偏好，究竟如何与文学的本质发生关联？让我们一探究竟。

## 一、本土奖项与公共议题

2020年度美国重要文学大奖均由族裔作家揽获，均匀分布在华裔、

\* 本文受国家留学基金项目（202106010188）资助，是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1世纪美国灾难文学研究”（21YJC752008）的研究成果。

非裔、拉美族裔之中，<sup>①</sup>从颁奖选择，到文本指涉时事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文学界的政治正确。

路易塞利写作《失踪儿童档案》有着非常直接的现实政治指涉意图。这本书复现的美墨边境无人陪伴移民儿童早于2014年已经出现，陷于失踪、死亡、性侵困境。不仅如此，对这些儿童的污名化充斥于现实社会：“（被称）非法外来者——如此有效地使其非人化。”<sup>②</sup>抵抗这种政治话语是瓦雷利亚的写作动机之一，<sup>③</sup>而作者在非法移民法庭担任志愿口译员的经历则为这一写作提供材料。

强烈的政治指涉意图在写作中得到了其他因素的中和与平衡。正如马龙（Tyler Malone）所言：“它做到了和政治相关但又免于宣传造势……呼应时事又能免于过时。”<sup>④</sup>带有政治映射目的的作品，为了避免沦为纯粹的政论性写作，往往伴随着文体革新。这体现在《失踪儿童档案》对迁徙情节的突破性书写。首先，本书描绘旅途的方式是对美国公路叙事传统的扭曲。第一部分通过母亲视角展开，女性录音师带着五岁女儿，与男性录音师及其十岁儿子构成重组家庭；一家四口带着彼此相异的目的从纽约驶往亚利桑那州：父亲致力于接近研究对象印第安族群，母亲一心营救朋友曼纽拉（Manuela）的两个女儿，她

---

① 2020年美国普利策奖颁发给非裔作家怀特黑德（Colson Whitehead）的《尼克尔男孩》（*Nickel Boys*），国家图书奖颁发给亚裔作家游朝凯（Charles Yu）的《唐人街内部》（*Interior Chinatown*），拉美裔作家路易塞利（Valeria Luiselli）的《失踪儿童档案》（*Lost Children Archive*）获2019年《纽约时报》年度书单和2020年美国安德鲁·卡内基优秀小说奖（Andrew Carnegie Medals for Excellence in Fiction）。

② Parul Sehgal, “Valeria Luiselli’s Latest Novel Is a Mold-Breaking New Classic,”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1,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02/11/books/review-lost-children-archive-valeria-luiselli.html>, [2021-03-15].

③ Gaiutra Bahadur, “Valeria Luiselli Traces the Youngest Casualties of the Border Crisi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6,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03/06/books/review/lost-children-archive-valeria-luiselli.html>, [2021-03-15].

④ Tyler Malone, “In ‘Lost Children Archive,’ A Southwestern Road Trip Reveals the Scars of America’s immigration crisis,”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7, 2019, <https://www.latimes.com/books/la-ca-jc-valeria-luiselli-lost-children-review-20190207-story.html>, [2021-03-15].

们正是被当局视为他者、进行关押收编的边境儿童。旅途内容包括婚姻破裂、景致凋敝、营救失败——夫妻二人不断产生分歧，丈夫计划在亚利桑那州长期居住，妻子期盼返回纽约公寓，再加上工作理念相悖，婚姻岌岌可危。他们路过的州际城市——弗吉尼亚州看起来如同被弃，俄克拉荷马州充斥着恶意标语和不怀好意的种族凝视。妻子一路关注录音广播的失踪儿童新闻，试图赶到该群体的集聚地机场却徒劳。这种自我受挫的表征意象，恰与美国文学传统中旅程的自我发现、自我觉醒构成对立面。因此，这些情节对于美国传统公路叙事是一种突破与解构。第二，本书采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描绘失踪儿童的漂泊之旅。交叉视角的另一展开角度——儿子视角，脱离了传统现实主义的领域。儿子自认地图上某一处是曼纽拉女儿的被关押地，遂独自带上年幼妹妹企图寻找，意识到迷路后又调整计划前往回音大峡谷（Echo Canyon），以期与父母重聚。两位儿童一度彼此失散，又离奇地寻回，甚至在路上偶遇曼纽拉女儿及其他在读物中出现过的儿童，最终兄妹顺利抵达大峡谷和父母相遇。这种书写漂民的手法——难以用理性和科学解释的奇遇，以及主角和其读物中的人物在现实的相见，在当代是一种突破。正如塞加尔（Parul Sehgal）指出，和当代西方作家以谨慎和复杂的虚构手法描述漂民以呼应难民危机不一样，瓦雷利亚以无拘束的想象力进行实验性重写。<sup>①</sup>第三，本书的创新性还体现在文体结构上。一方面，作者借着母亲讲故事的情节指涉了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如《蝇王》（*Lord of the Flies*）、《荒原》（*The Wasted Land*）等，马龙认为这是“将经典编织入文本的肌理之中”。<sup>②</sup>不仅如此，作者通过叙述者在故事里讲述故事，展现了一种相互平行的嵌套

① Parul Sehgal, “Valeria Luiselli’s Latest Novel Is a Mold-Breaking New Classic,”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1,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02/11/books/review-lost-children-archive-valeria-luiselli.html>, [2021-03-15].

② Tyler Malone, “In ‘Lost Children Archive,’ a Southwestern road trip reveals the scars of America’s immigration crisis,”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7, 2019, <https://www.latimes.com/books/la-ca-jc-valeria-luiselli-lost-children-review-20190207-story.html>, [2021-03-15].

结构形式。故事中占比最重的被叙述故事是所谓的意大利小说《失踪儿童哀歌》( *Elegies for Lost Children* ) ——关于一群无人陪伴儿童在边境任人宰割的经历,其情节和本书的故事情节、本书故事人物从新闻中得知的失踪儿童境遇具有相似性。然这实际是一本伪书,所以是作者刻意在故事内部设置了一个具有类似情节的故事,杨(Kristen Millares Young)称之为“复发的叙述平行”。<sup>①</sup>最重要的是,本书的整体结构——百纳布文档叙事(patchworked archival narrative),在讲述故事的方式上也是一种突破。全书共四大部分:家庭音景(Family Soundscape)、重演(Reenactment)、阿帕奇利亚(Apacheria)、失踪儿童档案(Lost Children Archive),共有二十个小章节,有些章节讲述故事,有些展示照片、录音、地图、失踪儿童信息等。巴哈德(Gaiutra Bahadur)认为这种结构呼应了小章节中多次出现的“混乱”字眼(chaos),这种讲述故事的方式拥抱了文档的无序、杂乱本质。<sup>②</sup>这种无序杂乱的 overall 结构带有隐喻意图,旨在表明历史不是整齐划一的单声部叙述。因此,该书在讲述难民故事时,采用具有突破性的故事情节和实验性的文体结构,在兼顾政治指涉意图的同时进行文体革新。

《唐人街内部》讲述亚裔吴威利(Willis Wu)在美国演艺圈的奋斗故事。吴威利是出生成长于唐人街的二代移民,其父母饱受种族歧视困扰,一直渴望离开唐人街融入主流社会。吴威利从小梦想成为功夫武打明星,他预设了以龙套演员为起点的职业生涯,在演艺界循规蹈矩,接受主流意识形态对亚裔的贬抑。他工作时认识李凯伦(Karen

<sup>①</sup> Kristen Millares Young, “An Author Delivers A Powerful Plea for Migrant Children,”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2, 201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entertainment/books/an-author-delivers-a-powerful-plea-for-migrant-children/2019/02/12/04588fbc-2a54-11e9-b2fc-721718903bfc\\_story.html](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entertainment/books/an-author-delivers-a-powerful-plea-for-migrant-children/2019/02/12/04588fbc-2a54-11e9-b2fc-721718903bfc_story.html), [2021-03-15].

<sup>②</sup> Gaiutra Bahadur, “Valeria Luiselli Traces the Youngest Casualties of the Border Crisi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6,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03/06/books/review/lost-children-archive-valeria-luiselli.html>, [2021-03-15].

Lee), 与之恋爱、结婚、生女。妻子蒸蒸日上的演艺事业提供了离开唐人街的机会, 他出于怯懦拒绝了, 沉沦于刻板印象的角色扮演之中。数年后, 吴威利意识到这种事业对自身是一种消耗, 遂离开唐人街。他又遭遇逮捕, 在法庭自辩过程中, 自我意识击败了内化的刻板印象, 最终顺应内心呼唤, 回归家庭。

吴威利的演艺圈生涯反映了美国主流社会对亚裔的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首先体现在亚裔演员只能扮演化约性角色。吴威利出演的《黑与白》(*Black and White*) 警匪剧, 如其名称所示, 亚裔只能在黑人与白人世界的夹缝中生存, “这是一个简化的世界, 亚裔在其中没有容身之地”。<sup>①</sup>黑人、白人角色设定极为丰满多面, 亚裔角色却通常带着蹩脚的外国口音, 被归类为面目模糊的“普通亚裔人”(Generic Asian Men),<sup>②</sup>这是对特定少数族裔的扁平化处理。这种化约性刻板印象最明显的特征是角色无台词, 这隐喻性地指涉了美国亚裔的日常失语处境。在剧中, 黑、白演员能自如地发挥, 吴威利目睹凶杀案出于本能发言时, 却被剥夺资格: “你怎么能说话呢? 你没有任何台词。”<sup>③</sup>亚裔角色经常被安排死去, 此后演员必须在屏幕前消失45天才能接演新的戏份, 这是对亚裔话语权的扼杀。这种沉默的刻板印象被亚裔内化成为自我投射的一部分。亚裔功夫男人正是刻板印象符号的一种, 吴威利预设世界上只存在一种酷炫的美国亚裔——会功夫的男人, 并一直渴望成为这一符号的银幕化身, 这是个体内化刻板印象的结果。他为此付出的努力被看作屈从于系统性种族歧视, “在这一系统中往上爬并不意味着你打败了这一套, 反而强化了它”<sup>④</sup>。吴威利一开始向往成为功夫明星, 到后来意识到功夫角色的诱捕, 就是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故事高潮里他在法庭自辩, 代表着他剥离已经内侵的刻板印象, 成为

① Claire Hopley, “Book Review: ‘Interior Chinatown’,” *Washington Times*, January 28, 2020,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20/jan/28/book-review-interior-chinatown/>, [2021-03-15].

② Charles Yu, *Interior Chinatow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20), p. 91.

③ *Ibid.*, p. 43.

④ *Ibid.*, p. 96.

全新自我。

书写移民刻板印象无疑有着强烈的现实指涉意图，此外，它新奇的文学手法也颇受关注：国家图书奖颁奖词称之为“具有惊人创造力的作品”，<sup>①</sup>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也赞扬其具有创新性。<sup>②</sup>这种对革新性的高度肯定，一方面指作者颠覆性地运用第二人称视角指涉主角：所有关于吴威利的场景都用“你”指代，使读者采用主角视角体会边缘化的处境。更重要的是，该书创造性地采用剧本结构。从目录看，《唐人街内部》全书共七个部分，它们不像寻常小说那样以章节分界，而是以“剧目”为界，故全书由七幕剧构成。每一剧目首页均列出本场次人名；角色的台词另起一行标注在居中的角色名称之后；作者甚至采用剧本通行的库里埃字体（Courier font）。这一切营造了阅读剧本的期待视野。

文本内容使读者难以区分故事现实与故事内部戏剧场景的分界。首先，通用于小说的“章节”字样被“剧目”取代，因而所有情节，无论是故事，还是故事中的戏剧扮演，在目录里都无差别地属于“剧目”的一部分。第二，情节内容本身正是角色人物出演戏剧，故正文“剧目”中的现实与“剧中之剧”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标识物。第三，部分情节本身具有难以区分的含混性。如小说高潮部分的审讯室部分，吴威利被逮捕后承认有罪——罪名是屈从于扮演亚裔刻板印象。这些情节中严肃和戏谑、现实和模拟的边界难以辨别，令读者感到新奇。以上两部作品无疑是强烈的现实观照之作，其文学性成就皆由文体创新实现。

《尼克尔男孩》以考古学发现开篇：少管所学校旧址被挖掘出大量人体残骸。随即呈现非裔男孩埃尔伍德（Elwood）的经历。埃尔伍

<sup>①</sup> Qtd. in <https://www.nationalbook.org/books/interior-chinatown/>, [2021-03-15].

<sup>②</sup> Maureen Corrigan, “Maureen Corrigan’s 10 Books That Will Connect You In A Socially Distant Year,” *NPR*, December 4, 2020, <https://www.npr.org/2020/12/04/941982629/maureen-corrigans-10-books-that-will-connect-you-in-a-socially-distant-year>, [2021-03-15].

德从小被父母抛弃，与外祖母相依为命。他勤奋好学，一心深造，如愿被大学录取。不料入学途中他误搭了偷车贼的便车，在种族凝视机制下，埃尔伍德被视作同犯，成为少管所管控对象——就这样从模范黑人降格成问题少年。少管所男校名为“尼克尔学校”，是以三K党（Ku Klux Klan）成员尼克尔（Trevor Nickel）命名的学校。书名《尼克尔男孩》也是该校学生的自嘲，指自己的命只值五分钱（nickels）。埃尔伍德意识到这所学校无异于集中劳动营：教学课程聊胜于无，学生大部分时间从事强制性劳动，劳动产品被学校和州政府无偿占有。性质更恶劣的是，黑人学生经常遭受毒打虐待。主人公在浴室和同学发生冲突时，监察员直接闯入记过。学生格里夫（Griff）代表黑人学生参加黑白拳击对决，被校监要求必须输掉比赛，他无意中获胜后竟被校监命人打死。埃尔伍德曾寄希望于通过外部力量颠覆校园暴力体制。州政府派人巡查校园时，他递上校园种族歧视的记录，但这一举动未对黑人学生处境有任何改善，反而招致校监记恨。得知自己将被处死，埃尔伍德和伙伴特纳（Turner）踏上逃亡之路，在被追捕过程中一死一伤。数十年后，饱受创伤记忆困扰的特纳决定向公众揭露真相。

埃尔伍德的经历体现了非裔遭受的种族主义生命政治暴力。少管所学校处于封闭状态，学生在空间上是和其他社会成员分隔出来的一群人。学生处于校监象征的主权的统治之下，又被排除在被保护的领域之外，被弃置与暴力与失法状态，是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定义中随时会死去的赤裸生命。成年特纳的经历体现了种族创伤的余波（aftermath）：他隐隐作痛的背部伤痕是种族压迫的肉体标记，其屡屡遭受的噩梦困扰是精神创伤的表现。他的昔日校友皮特（Pete）也饱受记忆困扰，表明这种创伤经历具有普世性。

作家构设的校园空间有强烈的现实映射意图。这一以多齐尔学校（Dozier）为原型的少管所学校，实则指涉了现实生活中千万所类似的种族主义教育机构。正如里奇（Frank Rich）引用怀特黑德的话：“只

要有一所，就会有上百所（类似学校）存在。”<sup>①</sup>另一方面，该学校暗示了具有同质作用机制的现实世界。福纳（Aminatta Forna）指出：“尼克尔学校是这个腐败世界的微缩版。”<sup>②</sup>除了场景的双重指涉，书中的很多细节也与历史现实一一对应：“例如粗暴的夜间毒打：男孩们被从床上抓起、带到白房子；以及杀戮。”<sup>③</sup>怀特黑德以精准的现实主义复现了一段被刻意遮蔽、遗忘的历史。

这种强烈的现实观照之下，《尼克尔男孩》以平实的现实主义展开。正如查尔斯（Ron Charles）所言，（主流社会）对待美国非裔的方式既奇异又可笑，所以任何玄幻加工（fantastical enhancements）都是不必要的。<sup>④</sup>除了被书评人反复提及的讽刺与反差手法，<sup>⑤</sup>《尼克尔男孩》还采用悬疑推进情节。两条叙事线索交叉进行——本书有两个位于不同年代、不同地理位置的叙述人称交叉叙述。一个是20世纪60年代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埃尔伍德，一个是80年代在纽约市生活的同名者。前十个章节采用青少年埃尔伍德的视角，呈现其在少管所学校遭受的毒打、辱骂、强制劳动。第十一章讲述成年人埃尔伍德的纽约创业经历，给读者制造期待视野——他最终脱离险境，过上自由生活。第十二章的叙述又转回青少年埃尔伍德，打破了这种人为构建的阅读前见：他被校监列入灭口名单，在逃亡路上遭枪击身亡。这种悬疑一直持续到第十六章节才解开：原来生活在纽约的成年埃尔伍德是一同

① Frank Rich, “In ‘The Nickel Boys,’ Colson Whitehead Depicts a Real-Life House of Horror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4,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07/14/books/review/nickel-boys-colson-whitehead.html>, [2021-03-15].

② Aminatta Forna, “The Nickel Boys by Colson Whitehead Review-Essential Follow-Up to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The Guardian*, July 26, 20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9/jul/26/the-nickel-boys-colson-whitehead-review>, [2021-03-15].

③ Ibid.

④ Ron Charles, “In Colson Whitehead’s ‘The Nickel Boys,’ An Idealistic Black Teen Learns A Harsh Reality,” *Washington Post*, July 9, 201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entertainment/books/in-colson-whiteheads-the-nickel-boys-an-idealistic-black-teen-learns-a-harsh-reality/2019/07/09/bab00918-a19b-11e9-b732-41a79c2551bf\\_story.html](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entertainment/books/in-colson-whiteheads-the-nickel-boys-an-idealistic-black-teen-learns-a-harsh-reality/2019/07/09/bab00918-a19b-11e9-b732-41a79c2551bf_story.html), [2021-03-15].

⑤ Ibid.



逃亡的特纳，在同伴去世以后，他取其姓名以作纪念。双线叙事达成了制造悬疑、解开疑案的效果。这种族叙事与疑案解谜并置，是严肃与通俗文学的杂糅。

三部作品在创作动机上汇聚于一处——反对特朗普政权暴力。瓦雷利亚自述《失踪儿童档案》的创作是她作为个体在记录政治暴力方面的一种尝试，结合特朗普对外国移民的污名化，该书的指涉对象不言而喻。向来从事科幻小说与电视编剧工作的游朝凯突然转向移民种族题材创作，是源于政治环境的影响。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采访时他表示，自己曾多年犹豫于是否创作种族题材作品，最终让他下定决心的催化事件是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sup>①</sup>类似地，怀特黑德在《地下铁路》（*Underground Railroad*）之后本不想再处理沉重的种族题材，但特朗普当选后，他“感觉必须（通过书写）理解作为一个国家的处境”<sup>②</sup>。严肃文学作家以书写对公共议题发表意见、表达立场，体现了文学艺术的政治性和介入姿态。这一趋势是对2019年美国文坛反特朗普主义思潮的延续，更加集中地汇聚于对白人至上意识形态的反抗。就文学手法而言，三部作品或有文体创新或有杂糅，但远未在审美成就上达到“喧宾夺主”、盖过公共议题指涉性的程度。换句话说，三本作品更多地因为其主题而得到关注，故美国国内三大文学奖项的颁发情况表明评委偏好现实观照之作。

## 二、国际奖项与个体化的诗性

和美国国内奖项趋向相悖，本年度国际性文学大奖更多地映射出评委对私人化写作与文学性的强调。

① Yvette Tan, “Interior Chinatown: The novel taking on Hollywood’s Asian tropes,” *BBC News*, December 13, 2020,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55182826>, [2021-03-15].

② Yahdon Israel, “The Outrage Was So Large and So Secret’: Colson Whitehead Talks Hope, Despair, and Fighting the Power in *The Nickel Boys*,” *Vanity Fair*, July 16, 2019, <https://www.vanityfair.com/style/2019/07/colson-whitehead-the-nickel-boys-interview>, [2021-03-15].

布克奖获奖作品《舒吉·贝恩》(Shuggie Bain)是一部成长小说,将母亲酗酒与儿子自我意识觉醒的情节并置处理。故事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里,20世纪80年代苏格兰格拉斯哥地区,母亲艾格尼斯(Agnes)与二婚丈夫、三个孩子、父母居住在政府公屋。丈夫常年出轨,对她打骂、强暴,父母也规训有加,艾格尼斯借酒消愁,和最小的儿子舒吉·贝恩最为亲近。第二阶段是母亲情况恶化和儿子深陷迷惘。丈夫将家人搬迁到环境恶劣的矿工社区后,声称从此脱离家庭。再加上随后父母相继离世的打击,艾格尼斯进一步沉湎酒精,甚至沦落至用性交换取酒钱。舒吉为照顾母亲,频繁旷课,受到同学质问;他天生敏感与矿工孩童格格不入;他甚至遭受了性侵。第三阶段里母亲走出阴霾,儿子学会反抗。艾格尼斯一度成功戒酒、找到一份在加油站的工作、发展了新的恋爱关系,似乎一切正在变好。她鼓励儿子直面心中的真正爱好——勇敢跳舞。舒吉已学会反抗性别凝视:被老师批评踢球不力时有同学在旁嘲笑,他回击挑衅。第四阶段是母亲死亡和儿子面对真实自我。艾格尼斯在男友的诱使下重拾酒杯,酒瘾复发不可收拾,最终再遭抛弃和失业。尽管母子二人企图通过搬家修正人生轨迹——母亲戒酒、儿子矫正性取向,但徒劳无功。舒吉与自己和解,向好友敞开心扉;艾格尼斯某日在酗酒中遭呕吐物窒息去世。

《舒吉·贝恩》是一部私人化写作的典型。陶东风曾就私人化写作提出四点定义,<sup>①</sup>这与《舒吉·贝恩》文本特点相互呼应。首先,作家与作品人物之间存在自传性关联。和舒吉·贝恩的经历类似,斯图亚特的母亲也在他16岁时因酗酒去世。虽然作家否认书中人物直接来自

① 陶东风定义的“私人化写作”特征包括:第一,表达的不是公共经验或群体意识,而是私人经验,特别是被社会公共的道德规范与普遍伦理法则抑制、排斥、遮蔽的私人经验。第二,大多采用“新回忆录”或“新传记式”叙述。第三,从作者角色上说,私人化写作的作者是一个小写的“我”(私人)而不是大写的“我”(群体、人民或公众代言人)。第四,从写作动机上说,私人化写作的驱动力是个人心理需要,尤其是无意识与隐秘欲望。详见陶东风:《“私人化写作”重识》,《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9期,第91—92页。

童年经验，但他肯定了两者的相似性：“小说当然是虚构的，但我的确是单亲母亲带大的同性恋男生。”<sup>①</sup>第二，《舒吉·贝恩》反映了被社会公共的道德规范与普遍伦理法则排斥、遮蔽的私人经验。母亲和儿子的经历分别指向酗酒、同性恋母题。母亲因酒精上瘾而屡遭抛弃、频繁失业，最终丧命，这是不符合社会公共道德标准的异类。男孩的敏感气质使他成为校园里、社区中的他者，饱受霸凌，他从自恨、反抗、修正、到与自身和解的性取向自我认知之路在社会遮蔽的阴影之中完成。第三，《舒吉·贝恩》的作者角色精准地落在私人经验的表达者与欲望的倾诉者一侧，与公众群体的代言人等“大写的我”相悖。阿特尔（Alexandra Alter）在书评中援引了斯图亚特的采访，作家表示，“它（这本书）更多地与爱有关，这在酒瘾（问题）之前。”<sup>②</sup>这句话的意思是，本书表达情感的功能相比提出社会议题有更重要的份量。作者也表达了对《舒吉·贝恩》的期待：“希望它是一部了不起的、个人化的项目”。<sup>③</sup>第四，《舒吉·贝恩》的写作驱动力是个人的心理需要。斯图亚特曾陈述自己写作的过程：“我坐下来写作《舒吉》这本书时，甚至没有意识到我正在写些什么。”<sup>④</sup>这种无意识与隐秘欲望的驱动正是私人化写作的典型特征。

《舒吉·贝恩》的文本接收过程体现了社会不同群体在文学的公共话题与私人化写作之间的偏好。这本书曾因远离社会热点而出版受挫。它前前后后被32家出版社拒绝，“出版商们狭隘的目光使得他们只能看到可能畅销的、与社会议题相关的作品，而忽略了一本书的艺术标

① 托比·利希蒂希：《道格拉斯·斯图亚特谈〈舒吉·贝恩〉和2020布克奖》，盛韵译，《澎湃新闻》，2020年12月13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344752](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344752), [2021-03-15].

② Alexandra Alter, “How ‘Shuggie Bain’ Became This Year’s Breakout Debut,”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3,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10/23/books/douglas-stuart-shuggie-bain.html>, [2021-03-15].

③ Qtd. in <https://thebookerprizes.com/the-booker-library/books/shuggie-bain>, [2021-03-15].

④ Alexandra Alter, “How ‘Shuggie Bain’ Became This Year’s Breakout Debut,”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3,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10/23/books/douglas-stuart-shuggie-bain.html>, [2021-03-15].

准”<sup>①</sup>。这表明社会大众对指涉公共时事的文学作品更为青睐。正是本书“去公共化”的倾向使布克奖评委对其褒奖有加。布克奖评委主席布斯比（Margaret Yvonne Busby）认为该书“注定要成为经典——这是对于紧密联系的群体及人们价值观的动人的、沉浸式、细致入微的描述”。<sup>②</sup>这似乎在传递一种信息：远离公共议题的文学和文学品质有着更加亲缘的联系。

另一文学事件也证明了这种联系。本年度美国文坛最具影响力事件是格吕克（Louise Glück）获诺贝尔文学奖。格吕克的诗歌是公共议题的反面，诺奖官网列出的她已出版的18部英文作品中，政治话题鲜有现身。她诗歌的核心主题包括童年、家庭生活、父母兄妹亲密关系、自我等，回避族裔、政治、宗教、性别等公共议题，属于私人经验的再现。

格吕克诗歌的个体经验母题被文学批评家、评委广泛承认。托宾（Colm Tóibín）指出，格吕克诗歌是私人性与神话性的混合<sup>③</sup>。美国有线新闻网络（Cable News Network）书评人霍夫曼（Richie Hofmann）认为格吕克的诗歌并不具有浮夸辞藻和公共形象（Public Facing）。<sup>④</sup>诺奖文学委员会主席奥尔森（Anders Olsson）将格吕克的诗歌成就归类为三个特质：家庭生活话题、峻朴的智性、诗集作为整体的精美构成感。<sup>⑤</sup>家庭生活无疑是个体体验，智性与美感都属于文学性审美层面。这些评论均指向一处：格吕克的诗歌是对个体化经验的记录。个

① 宫子：《2020布克奖公布，道格拉斯·斯图尔特凭处女作〈舒吉·贝恩〉获奖》，《新京报书评周刊》，2020年11月19日。

② Qtd. in <https://thebookerprizes.com/the-booker-library/books/shuggie-bain>, [2021-03-15].

③ Colm Tóibín, “Louise Glück: Colm Tóibín on a Brave and Truthful Nobel Winner,” *The Guardian*, October 9,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0/oct/09/louise-gluck-colum-toibin-on-a-brave-and-truthful-nobel-winner>, [2021-03-15].

④ Richie Hofmann, “Nobel Reminds Us Why Glück’s Poetry Matters Now,” *CNN*, October 8, 2020, [https://lite.cnn.com/en/article/h\\_bce1469fed6e8bdcef1509efac2dab19](https://lite.cnn.com/en/article/h_bce1469fed6e8bdcef1509efac2dab19), [2021-03-15].

⑤ Anders Olsson, “Biobibliography”, in *The Nobel Prize*,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2020/bio-bibliography/>, [2021-03-15].

体情感并不代表隔阂与特殊性，它往往由于文学性的加成而变得更具普世。与之相对的是，对公共议题的表述往往由于立场之争意味着分裂和差异。

正是其诗歌中个体经验与诗性的联结使格吕克的诗歌具有普世吸引力，这一点被诺奖颁奖词精准识别：“诗意之声，明白无误，以其凄美，个体存在，得以普世”（For her unmistakable poetic voice with austere beauty makes individual existence universal），<sup>①</sup>认为诗意是个体经验与普世性的重要联结。“普世”这个词也出现在霍姆斯（Helen Holmes）对格吕克获诺奖的评价中。<sup>②</sup>由此可见，是诗意——文学性让两个看似矛盾的概念耦合。

文学性与政治并不是彼此排斥的两极。尽管评委会一再强调诺奖颁发纯粹是出于文学性的考量，各国媒体报道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时，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是“安全”。如《纽约时报》称，“鉴于最近发生的争议，许多观察家都希望今年的奖项能够获得无争议的选择”。<sup>③</sup>的确，在经历诺奖评委会深陷性丑闻、以及2019年获奖者汉特克（Peter Handke）卷入支持种族屠杀政治立场的大背景下，将奖项颁发给一位毫无争议的获奖者似乎是首要考量。由此可见，对文学性的强调表面上意味着远离政治纷争，实际上恰恰是一种超越性的政治正确。

### 三、结语

的确，美国本土文学奖项和国际大奖之间存在明显的偏好差异。

① 此译文乃北京大学赵白生教授所译，由王理行转引，详见王理行：《关于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生命与颁奖词的翻译》，《外国语言与文化》，2020年第4期，第151页。

② Helen Holmes, “Why Louise Glück’s Bracing, Sensitive Poetry Deserves the Nobel Prize,” *Observer*, October 8, 2020, <https://observer.com/2020/10/why-louise-gluck-won-nobel-prize/>, [2021-03-15].

③ Alexandra Alter and Alex Marshall, “Louise Glück Is Awarded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9,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10/08/books/nobel-prize-literature-winner.html>, [2021-03-15].

必须意识到，美国作家以介入姿态表述立场时，无形中也遮蔽了不那么正义的、数量庞大的沉默之声。评委将美国本土文坛奖项赋予具有政治指涉意图的作品，无疑是对前者立场的支持与放大。如果文学是公共政治立场表达的阵地，而书写又逐渐成为学院派精英知识分子的专属，那这种文学书写与奖项颁发无益于弥合确切存在、愈演愈烈的差异。

从消解差异的角度而言，世界性文学大奖颁发给进行个体私人叙事的作家，号召文学回归文学性，无疑走在美国文坛前头。文学作品表述对爱、死亡、生命、毁灭等人之存在的普世话题，能跨越种族、地域、立场的界限，引起更多群体的共鸣。对文学本质的强调，能够让人们搁置争议，回归最纯粹的阅读本身。

这种公共议题与私人写作的分野，既指涉了文学自产生以来、自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存在的文艺自足论与反映论之争，也体现了当代思潮的撕裂。这会对2021美国文坛产生何种影响？且拭目以待。

